

岳 麓 新 闻 传 播 学 论 从

总主编 吴高福

影视理论与批评

何春耕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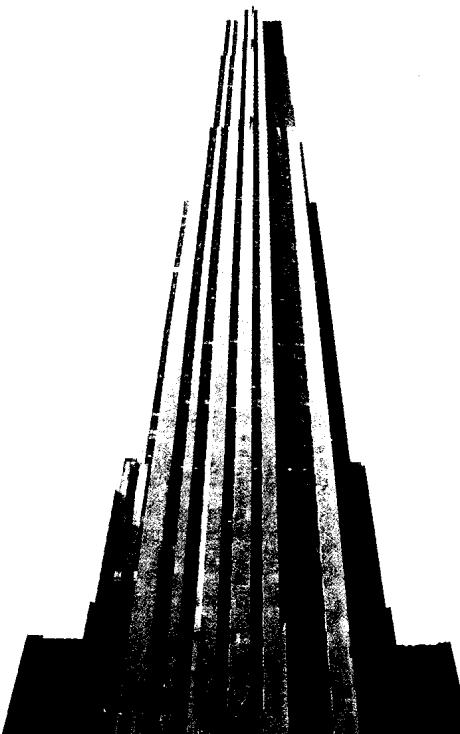
岳麓新闻传播学论丛

总主编 吴高福

影视理论 与批评

何春耕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要

以多维的理论视野,从社会、历史、文化与审美等角度重点研究了中国影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观念变革与理论建构。具体分析了中国电影传统的形成与类型特点,并主要从文化与审美的角度对中外当代优秀影视作品进行解读,探讨了一些当代中外优秀影视作品的艺术审美创新魅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影视理论与批评/何春耕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10

(岳麓新闻传播学论丛)

ISBN 7-81113-100-5

I. 影... II. 何... III. ①电影理论—研究—中国

②电视—艺术理论—研究—中国 IV. J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7145 号

影视理论与批评

Yingshi Lilun Yu Piping

作 者:何春耕 著

责任编辑:肖立生

封面设计:吴颖辉

责任校对:全 健

出版发行: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湖南·长沙·岳麓山 邮 编:410082

电 话:0731-8821691(发行部),8821594(编辑室),8821006(出版部)

传 真:0731-8649312(发行部),8822264(总编室)

电子邮箱:pressxiao@hnu.cn

网 址:<http://press.hnu.cn>

印 装:湖南省地质测绘印刷厂

开本:880×1230 32开 印张:8.25 字数:238千

版次:2006年11月第1版 印次: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册

书号:ISBN 7-81113-100-5/I·37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与发行部联系



何春耕，湖南省永兴县人，电影学博士。现为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员，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影视文化，公开发表论文和影视评论60多篇。

已经出版的专著有《中国伦理情节剧传统——从郑正秋、蔡楚生到谢晋》、《电影世界之旅》等；出版译著有《后理论：重建电影研究》（与人合译）、《埃利森传：我打造了甲骨文帝国》等。

目 次

文化想象：观念变革与理论建构

论邓小平文艺思想对新时期电影发展的影响	(3)
论“三个代表”与中国广播电视台改革	(11)
谢晋电影创作观念略论	(21)
中国电影传统刍议	(36)
论中国电影传统类型的生成	(50)
论新世纪电视栏目发展与主持艺术人才培养的互动关系	(61)
化有形为无形	
——论电视新闻评论审美表现方式的功能与转变	(70)
中国最流行电视台的“怪味豆”	
——论湖南卫视《晚间新闻》的创新谋略	(80)

文化表征：镜像思辨与人文守望

文化精神的一种表征

——中国电视娱乐化倾向的文化思辨	(87)
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的儒家文化情结	(93)

“西部趣味”与文化姿态

——论中国西部电影	(120)
郑正秋：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文化传统的开拓者	(131)
论蔡楚生的社会/伦理情节剧电影的文化特征	(144)
中国伦理情节剧电影文化的情感化表述	(157)

穿越历史之镜的诗情凝结

- 论 J. 伊文思的纪录电影的文化内涵 (169)
多维视野中的文化寓言
——论伦理情节剧电影中的女性化叙事策略 (177)
徘徊的尴尬与超越的追寻
——世纪之交中国爱情片的文化突围 (185)
中国电影产业化面面观 (190)
当代影视文化启示录
——读《镜像阅读——九十年代影视文化随想》 (196)
为人文精神守望的《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 (198)

文化解读：审美追求与诗意创造

新的历史高峰

- 漫谈电影《天云山传奇》的审美追求 (207)
意象缤纷 意味隽永
——论电影《春桃》的意象美 (216)
《不见不散》的艺术魅力 (223)
《故园秋色》：美丽真情的人生境界 (228)
《荆轲刺秦王》：不见英雄 (230)
至情的美丽 魅人的艺术
——《我的父母亲》创作风格简论 (232)
“诗意的栖居”
——评影片《农民贵根的三个梦》 (238)
大众文化梦想与电影艺术品位的组合
——论电影《手机》的“变脸”策略 (241)
《成长》中的阳光、梦想和雾障 (247)
《拯救大兵瑞恩》：美国英雄神话的经典叙述 (250)
《大学女孩》：闪亮青春与美丽人生 (252)

- 后 记 (257)

文化想象：
观念变革与理论建构



论邓小平文艺思想对新时期电影发展的影响

邓小平的文艺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于文艺工作，邓小平作了系统的论述和阐发，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这些思想和观点，是邓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新时期党的文艺政策的集中体现。邓小平的文艺思想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艺术的繁荣起了积极作用，对新时期以来的电影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确立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方向，为新时期电影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在我党的历史上，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文艺理论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1980年7月，党中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下简称“二为”），这一新时期文艺工作者的总口号，明确了文艺的服务对象，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决定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① 在当今我国社会阶级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复存在，知识分子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农兵已经不能代替全体人民，文艺服务的对象应扩大到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的人民大众。因此，这一提法更具有广泛性和现实性。邓小平还说：“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209页。

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① 在邓小平的文艺思想中，对“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概念有十分精辟的分析：“只要有益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世界观、理想、品格、信念、意志、智慧、勇气、情操和整个精神境界，都是为人民服务。”^② 同时，邓小平还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③ 对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邓小平认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因此，社会主义文艺要充分体现人民的利益与愿望，满足人民不同层次的、多方面的、丰富的、健康的精神文化需要，激发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声音，每个时代都要为自己的声音寻找最适当的载体。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电影是中国文艺发展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在变革的社会政治大背景和邓小平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它以宽厚的艺术思想和丰富的人生内容，显现了全新的精神风貌，突破了旧的审美规范，创建了新的格局。在新时期电影短短的 10 年中，其创作（主要是故事片创作）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首先，在“二为”方向的指导下，电影艺术创作生产力获得空前解放，电影创作数量达历史最高记录。据统计，我国故事片的产量在“文革”前的 17 年里总计 603 部，而新时期以来 10 年总产量约 1000 部^④，而且一定的数量体现了一定的质量。尽管其中也有少量粗制滥造、质量低劣之作，但从整体和主流看，广大电影工作者在“二为”方针鼓舞下焕发出来的高涨的创作热情和才能得到了应有的施展和发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第 22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第 213 页。

^③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2 年出版，第 323～324 页。

^④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新时期电影 10 年》，重庆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第 39 页。

挥，从而顺应了广大群众渴望丰富精神文化生活的客观需要。

其次，电影制片规模迅速扩大，形成了遍布全国主要地区的故事片创作生产基地，为促进电影的繁荣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文革”前 17 年里，故事片生产主要由长影、上影、北影、八一四家老厂承担。新时期 10 年里，随着电影创作发展的需要，至目前我国已有 16 家故事片制片厂^①。这些新建的制片厂，短短几年内佳作迭出：如，西影的《人生》、《野山》、《黑炮事件》等，珠影的《乡音》等，广西厂的《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等。这些优秀影片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甚至是在世界电影发展史上都具有一定影响。

再次，新时期电影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不仅有许多优秀影片受到国内观众的喜爱，并获得了政府和人民的奖励。而且不少影片为国外电影观众所称赞，许多影片多次在国际性的电影节上获奖。从王文和辑录的“新时期电影 10 年故事片（包括舞台艺术片）在国内获三大奖情况一览”^② 的统计看，1979 年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的故事片共 22 部，舞台艺术片 1 部；1980 年获此项奖的故事片是 8 部，舞台艺术片 1 部；1981 年获此项奖的故事片是 10 部；1982 年获此奖是 9 部，舞台艺术片 1 部，特别奖 3 部；1983 年获此项奖达 17 部；到 1984 年获此项奖的故事片是 15 部；1985 年是 10 部故事片获得此项奖。此外，从 1981 年起设有中国电影金鸡奖，从 1977 年起设有《大众电影》百花奖等，通过多种奖励方式鼓励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在社会上造成了较大的积极影响。再从新时期故事片在国际上获奖情况看，据有关人士统计^③，新时期电影仅从 1980 年至 1986 年在国际上各个不同的电影节上获奖的次数就达 46 次之多，其中优秀影片《泉水叮咚》、《城南旧事》、《黄土地》、《野山》等多次获国际性电影大

^①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新时期电影 10 年》，重庆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第 39 页。

^②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新时期电影 10 年》，重庆出版社 1988 年出版，第 436 ~ 461 页。

^③ 耶牧君：《怎样看待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大众电影》，1985 年第 1 期。

奖。这些大奖的获得充分体现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巨大潜力和影响，确立了中国新时期电影在国际上的地位。

二、强调文艺工作者要遵循文艺的发展规律，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为电影发掘自身艺术特性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在建国以来相当一个时期内，中国电影在高于一切的政治潮流的裹挟下，主要成为一种贯彻某种政治路线、图解某种政治概念的工具。在“文革”期间，电影则成了最恶劣的政治——“四人帮”政治的工具，“四人帮”借样板戏树立自己的政治形象，又炮制了《春苗》、《决裂》等直接鼓吹反动政治路线的作品，电影成了政治利用的工具，电影自身也被这种政治改造成为一种僵化的斗争冲突模式，“三突出”模式，“高、大、全”模式等等。粉碎“四人帮”后，中国电影转到了人民一边，出了不少揭露“四人帮”的罪行，肯定党和人民斗争的电影，如《严峻的历程》、《失去记忆的人》、《峥嵘岁月》等。但是，这些影片仍然是某种既定的政治意念的体现，在艺术上大多数影片也仍受缚于与政治观念密切相联系的僵化模式。由于这一时期的政治转折并不彻底，对电影艺术的转折还没有多少触动，所以“三突出”、“高、大、全”等一类僵化的艺术原则和模式仍在电影中保留下来。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整个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得到了调整。对文艺，党的领导主要是靠正确的思想和理论基础，靠正确的方针、政策。首先是要研究和掌握文化工作的规律，按照文化工作的特点和发展规律确定领导方式。邓小平同志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①“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邓小平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213页。

的论述表明，文艺工作只有遵循文艺的发展规律，加强和改善党的文艺工作的领导，我们的文艺工作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才能形成社会主义文艺繁荣昌盛的局面。

在这一文艺思想的影响下，新时期电影在艺术形态方面出现了多样化、多层次的局面，电影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同时，从电影的不同角度探讨其自身发展规律，如从电影语言现代化讨论、电影与戏剧“离婚”、电影文学性的争论，一直到电影观念的探讨，推动了电影创作的发展。从新时期电影创作实际看，在电影的艺术技巧、艺术内容、艺术思想等电影观念上出现了许多新的探讨和发展，这促进了电影艺术表现力的充分发挥，推动了电影形态走向多样化。

第一，从电影结构形式上的创新看，结束了长期以来戏剧式结构一统影坛的局面，出现了多种结构样式的影片。如直接以人物内心活动构筑影片框架，重人物、轻事件的心理结构（《天云山传奇》）；借意识流的手法，由心理结构延伸而来，以人物情绪的起伏变化来结构影片（《陌生的朋友》）；有组织地表现无组织的生活状态的散文结构（《城南旧事》），等等。这些丰富多样的结构形式，既适应了表现丰富多样的剧情内容，也有利于深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第二，一些纪实风格的影片也丰富了电影形态。以《沙鸥》、《邻居》等为代表的这类纪实影片，打破了传统的戏剧式风格，在艺术创新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某些要求“求真不求戏”，表现生活的自然实态和自然流程的艺术观念，以及淡化故事情节、淡化人物性格的外部冲突、注重情绪反应和思想感情的内在矛盾的开放式结构形式，都体现了新时期中国电影艺术多样化追求的实绩。

第三，随着电影艺术上有独创意识的“第五代导演”的新作的出现，电影形态多样化的发展又往前跨进了一步。如《黄土地》、《一个和八个》、《猎场扎撒》、《喋血黑谷》、《黑炮事件》等影片，导演们通过全新的银幕造型，突出影像内在的表意功能等电影手段，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对电影艺术思想的新探索。

三、坚持思想标准与艺术标准相统一的文艺批评标准，为新时期电影批评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文艺批评是文艺理论的重要组织部分，也是我们党领导文艺的主要方法之一。健康、正常的文艺批评，既有助于文艺发展与繁荣，也有利于保证党的文艺政策贯彻执行。早在 50 多年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了文艺批评的两个标准，即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但是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却往往变成了“政治标准唯一”，把文艺创作中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政治问题，文艺批评出现了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因此，许多优秀影片被当成是有问题的作品。对此，邓小平正确指出：“对于一部作品，应该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去评价”，应当说邓小平提倡的“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比“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提法更符合新时期党对文艺作品的总要求，也更符合文艺创作的实际。因为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涉及的方面很多，它包括政治观点、社会观点、哲学观点、历史观点、道德观点、艺术观点，等等。邓小平同志认为：“不能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仅仅归结为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毫无疑问，革命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对革命作家是绝对重要和必要的），不能孤立地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硬要那样做，就必然导致实践上的简单粗暴，妨碍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健康发展。”^① 邓小平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论述是十分切合实际的。

许多年来的中国电影批评实践也充分说明，从政治标准出发，往往把一些不带政治性的优秀影片也排斥在优秀作品之外，或者把一些不直接表现政治斗争的电影作品，变成某种观点的图解物，牵强附会地硬拉到政治上来，贴上政治标签，这些不符合实际的做法在新时期的电影批评中有明显的改变。从新时期 10 年的电影美学走向看，80 年代中期的许多优秀影片，不但对社会政治的独立思考意识有所增强，如优秀影片《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人生》、《野山》、《黑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编：《党和国家领导人论文艺》，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2 年出版，第 210 页。

炮事件》等，而且对人的主题探索多是表现了艺术家独特的思考，融进了艺术家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如《牧马人》、《城南旧事》、《骆驼祥子》、《乡音》、《良家妇女》、《青春祭》等，表现了对人、人的命运、人的价值、人性和人道主义等问题的关注。这些影片还体现了电影在自身的美学现实中所包含的社会、历史等人文内涵，从而为观众所喜爱，也为电影批评界所接纳和推崇。

四、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进一步推动了新时期中国电影与社会和观众关系的和谐发展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繁荣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尽管早在 1956 年毛泽东就提出来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真正实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如何正确地理解和贯彻这一方针作了新的阐发。首先，邓小平认为，坚持双百方针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安定团结是一致的。他说：“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这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我们要坚持安定的团结，但是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① 邓小平还认为：“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如果发生矛盾，只有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才能让大家有秩序地前进。”^② 其次，邓小平认为，坚持“双百”方针，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是一致的。他说：“我们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不会改变的。”^③ 可以说，邓小平对“双百”方针的论述，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新时期发展文艺的客观规律。

随着新时期新形势的变化，电影理论界对电影如何适应社会，如何发展自身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一是 1985 年李陀和陈荒煤在《当代电影》第 5 期和 6 期上，发表了关于“情节剧”的通信，展开了关于“情节剧”的讨论，则代表了把观众的要求与电影自身的特点结合

^①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第 256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第 253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第 392 页。

起来思考的一种努力；二是关于如何处理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的矛盾，邵牧君企图为“商业电影”正名，以此为电影争取了更广大的观众。他认为：“在现代社会里，根本不存在不是商品的电影，把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加以对立，似乎有了商业就不能有艺术，要艺术就非得不顾票房价值，这完全是一种谬论。”^①这些观点和研究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观众对于最终实现电影价值的影响和作用，并有力地影响了创作。1985年出现的打斗片、侦破片、惊险片、娱乐片，其数量超过以往任何一年。尽管这些影片就自身的艺术成就和思想成就而言，确实不如同时出现的探索片，其中大多数还没有达到真正“商业片”的水准，但是这一追求和趋势却体现了“双百”方针在新的形势下的正确实行。因为承认“商业片”为广大观众提供了文化消费和精神商品，体现了新时期多元格局和开放原则的良好态势。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① 邵牧君：《怎样看待商业电影与艺术电影》，《大众电影》，1985年第1期。

论“三个代表”与中国广播电视台改革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我国广播电视台的内在发展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对广播电视台改革和发展具有最直接的影响。广播电视台这种运用高新科技武装起来的现代化传媒，在我国它始终都与先进的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始终是代表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需求，这是我们在新的世纪进行广播电视台改革和发展的根本目的、根本立足点和根本归宿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我国广播电视台的内在发展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对广播电视台改革和发展具有最直接、最突出的影响

江泽民同志总结我党近 80 年的建设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①。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体现了我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标志着我党社会主义文化观的形成、发展和成熟，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前进方向和重要任务。

从文化建设的角度看，“三个代表”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内在的发展要求，也反映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既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精华，又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消费需求呈急剧增长态势，特别是大众化、

^①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出版，第 2 页。